

经济学

(第十四版) 上

[美]

保罗·A·萨缪尔森
威廉·D·诺德豪斯

ECONOMICS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经 济 学

第 14 版(上)

[美] 保罗·A·萨缪尔森 著
威廉·D·诺德豪斯

胡代光 余 斌 张军扩 何振华 译
吴珠华 汪 洪 田正育

李渝林 校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第十四版/[美]萨缪尔森(Samuelson, P. A.),
[美]诺德豪斯(Nordhaus, W. D.)著;胡代光等译.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1996. 6

ISBN 7-5638-0575-3

I. 经… II. ①萨… ②诺… III. 经济学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9876 号

ECONOMICS

Fourteenth Edition

by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

McGraw-Hill, Inc. 199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5.875 印张 1233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4 次印刷

印数:40 001—50 000

ISBN 7-5638-0575-3/F · 339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6-0642 号

定价:62.00 元(上下册)

本书出版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红	杨 玲	陈文冰
李玉山	周义军	周嘉硕
骆鸣渊	赵颖君	蒋 明
薛 捷	霍瑜宗	

作者简介

保罗·A·萨缪尔森——著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研究生部的创立者，受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他的许多科学论著使他在年轻时代就闻名世界，他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美国人（1970年）。萨缪尔森教授长期为《新闻周刊》的经济学专栏写稿，他是能够联系普通群众的那些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经常向国会作证，并任职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财政部和各种私营的与非营利性的组织机构的学术顾问。他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萨缪尔森教授每天打网球，当三胞胎出生时，他的家庭规模就翻了一番。

威廉·D·诺德豪斯——美国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生于新墨西哥州，他是耶鲁大学本科生，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是耶鲁大学A·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讲座经济学教授，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成员。他的经济学研究跨越了广泛的种种论题——包括环境、通货膨胀、能源、技术变革、管理、资源经济学以及利润和生产率的趋势。此外，诺德豪斯教授对经济政策还持有浓厚兴趣。1977—1979年，他任卡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1986—1988年，任耶鲁大学教务长，偶尔也为《纽约时报》和其他杂志写稿。他在耶鲁大学经常讲授“经济学原理”课程。诺德豪斯教授及其家属居住在康涅狄格州新哈文（New Haven），爱好音乐、长途步行和滑雪运动。

中译本序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经济学》教科书的中译本,其原著者是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1970年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A·萨缪尔森和年轻一代、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威廉·D·诺德豪斯。

(一)

本书自1948年出第一版以来,在约近半个世纪内,随着世界经济情况的变化和不同时期的需要,已不断加以修改和补充。现在翻译出版的这部《经济学》是1992年在美国首先印行的第14版。自1948年本书第一版问世以后,经过许多次重版,久已成为世界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而且,该书已被译为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中文、阿拉伯文、俄文、匈牙利文、捷克文、罗马尼亚文、塞尔维亚文、越南文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字,共达40余种以上文字的译本。据报道,迄今销售量累计超过了1 000万册。

本书在我国首次被译为中文版是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鸿业教授摘译的该书第5版中的部分章节(原著第5版出版于1961年)。后来商务印书馆于1979年再次出版该书第10版(原著第10版于1976年出版)的全部内容,中文译本(分成《经济学》上、中、下三册),仍由高鸿业教授翻译。1992年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第12版(本版由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

合著,1985年出版)的中文译本,由高鸿业教授负责总翻译和校阅。这版书的序言中写道:“这第12版是自从1948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版问世以来修订最彻底的一版。”(中译本《序》第1页)

(二)

本书作者萨缪尔森在完成《经济学》第14版之后自称:“我已成为晚期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代言人”。确实地,萨缪尔森于1948年出版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以后,便开始确立了凯恩斯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他在《经济学》第三版(1955年)中提出“新古典综合”一词,意指在他的《经济学》中是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马歇尔的微观经济理论“综合成一体”。在《经济学》第6版(1964年)中,萨缪尔森又进一步解释:“新古典综合”就是“总收入决定理论的要素与早先的相对价格和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相结合”(《经济学》1964年英文第6版,第809页)。因此,西方有些经济学者断言:“新古典综合”就是在瓦尔拉斯的困境中搀和凯恩斯而产生的,解决的方法是,当瓦尔拉斯定律(在均衡中,超额供求之总和等于零)似乎不产生充分就业的时候,那就加入少许的凯恩斯的财政金融政策,直到这个定律生效为止。

由于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相继出现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即所谓“停滞膨胀”,以萨缪尔森为首领的新古典综合派便受到各方面的抨击,例如,新剑桥学派把新古典综合派看成是“曲解凯恩斯理论的冒牌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断定它忽视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新制度学派指责它提倡的财政金融政策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新自由主义者更认定其时出现的“停滞膨胀”局面是信奉和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恶

果。因此,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8版(1970年)就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简称“主流经济学”)取代原先用的“新古典综合”这一术语来表明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体系。后来,萨缪尔森在该书第十一版(1980年)中,进一步对“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解释道:“本书的全部致力于阐明后凯恩斯主义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流行于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流行于英国和荷兰而又日益流行于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西方世界大多数地区的主流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得的成果,是使混合经济制度的作用得到了改善。”〔转引自范家骧、高天虹著《西方经济学》下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425页〕可见,萨缪尔森仍然认为,他自己是凯恩斯主义的“正宗”,或“正统继承者”。

(三)

1985年,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合作,出版了《经济学》第12版,他们把本书的理论体系又改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他们宣称,在这版书中,“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几章现在使用了具有综合性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方法”;“我们引入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作为理解价格和国民产值的总量变动的核心方法。宏观经济学中的所有重大问题现在都用这些新的工具加以分析。因此,我们把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凯恩斯主义、古典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以及现代宏观主流经济学——综合在一起”。(《经济学》第12版,中译本,上册,《序》第1页、第2页)所谓“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的含意即在于此。

萨缪尔森的治学方法向来以折衷和综合著称于世,诚如国外有的经济学者所评说的:“在经济信仰变化莫测的大动荡中,萨缪

尔森多年来坚定地立于科学公正的基石之上。在受到激进的右翼和左翼经济学家挑战时,萨缪尔森坚持了这样的原则,即对于那些引起争论的事实,完全可以不带着赞美或憎恶这类感情色彩来给以阐述。”(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53页)

萨缪尔森自己认为:“对本书的各种评论加速了经济思潮”;“许多岁月过去了。我的头发由淡黄色转为棕色,然后转为灰白色。但是,像从未长得年老的多里安·格雷的肖像一样,这本《经济学》教科书会长久地保持到21世纪;”而“从有课堂经验的学生们和教授们的许许多多来信和建议中得到的帮助,在本书封面之内的经济学已进化和发展了。主流经济学说的历史学家,像研究地球不同阶层的骨骼和化石的古生物学家一样,会通过分析第一版如何被修订为第二版,最后又修改成为第14版而确定经济思潮涨落的年代。”(《经济学》第14版,《经济学和永葆青春》)

(四)

现在我们译出的《经济学》第14版与该书以前各版相比较,其内容又进一步作了重大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微观开端”,即在本教科书的基本结构中,将微观经济学置于宏观经济学的前面。这是因为当今许多教师都认为,宏观经济学原理只有在掌握了微观经济学的严密推理之后才可能更透彻地了解。二是“市场再发现”,即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声称:现今,“遍及世界的各个国家正发现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工具的力量”;而“市场再发现在市场经济中同样被找到”。(《经济学》1992年英文第14版《序言》)除此而外,本版《经济学》教科书还强调了开放经济的考察和

研究,强调了博弈论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强调了历史和政策,即利用案例研究和经验证据来阐明经济理论;重新注意到形成长期经济增长的力量,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根源,新技术知识的产生,从而把经济增长理论结合到宏观经济学中,作为总供给和潜在产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

萨缪尔森是“混合市场经济”(把私营经济和公共控制混为一体的经济体制)的赞扬者和倡导者。他认为:“更一般地说来,市场就是买方和卖方相会合以交换东西所利用的一种机制。市场可能是集中化的(就股票、债券和小麦说来),或是分散化的(就住宅或旧汽车说来),甚至也可能是电子市场(如对于许多金融资产和服务所出现的这样市场)。市场的关键特性是,它使买方和卖方一起确定价格和数量。”简言之,“市场就是一种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相互影响以决定其价格和数量所利用的一种机制。”(《经济学》1992年英文第14版,第36—37页)

市场如何起作用?据西方经济学者的意见,确切地说来,即市场机制如何运作以决定价格、工资和产量这三个基本经济问题。萨缪尔森将这三个基本问题概括为通过市场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在萨缪尔森看来,这三个基本问题是一切经济制度所共有的,但不同的经济制度却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学说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和没有市场失灵的假定前提条件之下的,而当存在垄断、外部效应、公共品、信息不对称等情况时,“看不见的手”的显著的效率特性就会被破灭,即市场机制并不总是达到其完美理想境界。

据此,萨缪尔森指出:“为回答市场机制的缺陷,各国都采用政

府的看得见的手,以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并行。政府凭拥有和经营某些企业(如军用业)以取代市场;政府控制一些企业(如电话公司);政府花钱用于宇宙空间探索和科学研究;政府对其公民征税并再分配收入给贫穷人民;政府运用财政金融力量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制服经济周期。”萨缪尔森断定,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有三方面:促进效率、提倡公平和扶植宏观经济增长与稳定。(《经济学》1992年英文第14版,第41页)

(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努力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抓紧学习经济业务知识而论,我们翻译出版的这部《经济学》教科书第14版,确是值得参考、借鉴、利用并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问题的。

胡代光

1996年1月8日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译者的话

这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第14版,由我们译成中文出版,实感责任之重大。因为不管原文是如何之好,而译成其他文字是否能体现其原貌那是另当别论的。翻译确实是一种再创造。

电影工作者有时把电影称为“遗憾”的艺术,因为制作完成后常常感到一些地方不尽人意,为什么当时没有修改呢?深感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也是一种“遗憾”的工作。据说,我国的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每日只译500字,可见他落笔千斤、精益求精的精神。然而,在生活、工作节奏如此之快的今日,“精雕细刻”有时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出版社一般要把译稿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说来这都是由于“竞争”所致。由于快节奏的原因,加之水平所限,我们的译文难免有“遗憾”之处,还望读者多加指正。这是诚恳的话语,而非虚言。然而,我们必须说我们是尽了最大努力了。在整个校译过程中,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对其他译者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对他深表谢意。

本《经济学》教科书从1948年第一次出版以来,结合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经各个版本的修改,理论和实践始终紧密结合,可以说从各个版本的演变中能够看到活生生的几十年美国经济学发展的演变状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特别是我们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美国经济的过去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些也会在我国出现。因此,本书的出版有助于读者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对有关经济学的原理进行研究。

希望本书在广大读者学习、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译者

1996年2月

经济学和永葆青春

写一部初级经济学教科书，这决不是我的念头。我的麻省理工学院系主任拉尔夫·弗里曼(Ralph Freeman)1945年到我这里对我说道：

保罗，有一项建议你是不能拒绝的。一年的经济学课程是我们麻省理工学院学生的必修课。可是，学生们感到经济学单调无味。

你需要多少时间，就给你多少时间，写一本人们将会喜欢的经济学新书。它可以像你希望的一样简略，包括你认为重要的论题。我确信，它将是一部畅销书。

更重要地，你将对一代人的教育作出贡献。于是你将有两种荣誉。在夸耀的数理经济学的新领域进行开垦的经济理论家保罗·萨缪尔森；对于在公民中促进经济学的知识和理性的了解方面，已尽了责任的保罗·萨缪尔森。

开始的时候，我发笑，我犹豫，然后我认可了。木已成舟。如他们所说的，其余的是历史。

我的出版者麦格劳—希尔公司和我的合作者，耶鲁大学的比尔·诺德豪斯请求我讲一讲这一情况。所以，在这里讲一下。

回到课堂

1945年是关键时刻。德国和日本被击败了，美国各高等院校完全充满了退役人员和战时的工作者。经济学处于有生气的时期。1929—1935年的经济大萧条最后为强有力的纲领所战胜，以至扔掉了毫不起作用的财政金融政策的旧传统做法这个橱窗。英国和美国后来动员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功的战时经济，以致希特勒、

墨索里尼、裕仁天皇的首领们做梦也未想到。虽然我们在1945年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成功的马歇尔计划和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占领却为“凯恩斯以后年代”奇迹般的几十年战后经济增长的舞台设置了布景。

院校学生们值得了解这一切。但是,当我这一代的教师们知道了我们的遗憾时,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却是非常过时的。初学者厌烦起来,这毫不惊奇——不仅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在哈佛大学,我的学生常常露出那种没有神采的脸色。

这个叙述必然不像幽默家杜利先生认为的那样,用虚构的篇名《我和古巴》是特迪·罗斯福的杜撰作品。如果牛顿未发明微积分(可是他发明了),那么莱布尼茨或者名叫史密斯的某人也会作出同样的发明。如果1948年我的《经济学》未把购买大炮和黄油的选择写进基本的微观经济学,那么某人在某处很快就会这样做。在我的《经济学》第一版出版的时候,甚至“宏观经济学”这个词——研究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失业,决定着它的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率及其真实GNP增长率——在词典上尚未出现!一些学者就必须一道走并彻底改革经济学的初级教材。

但是,为何由我来改革?我是从麻省理工学院放射实验室回来的,在该室我从事于设计击退敌人轰炸机的自动伺服机构(automatic servomechanisms)的数学工作。可以说,我渴望回到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来。我当时30岁,是撰写教科书或革新专题论文的最佳年龄。由于碰上好运,我的高级的《经济分析基础》(此书使我25年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已在印刷。机不可失,要写作一本教科书。但是,首先我必须说明一个内情。在当时那些日子里,一个有前途的学者不应该写作教科书——当然不一定是开始的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基本教材。只有雇佣文人才应该写教科书。但我已发表了那样多的研究论文,似乎我的一生享有的声望和前程能给予我自由行动的机会来积极响应麻省理工学院写新教科书的请求。在过去那些愉快的日子里,产生趾高气扬的,甚至傲慢的,是

我自己,我不得不高兴。

对我来说,一个确定无疑的论据是:莱纳斯·波林(Linus Pauling)这位伟大学者和人道主义者获得两次诺贝尔奖金,他已经写了一本第一流的化学教科书——正像伟大的理查德·范曼(Richard Feynman)后来出版了古典物理学讲义一样。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早已发表了他的卓越著作《心理学原理》。理查德·库兰特(Richard Courant)在德国西部城市格丁根居于高位,他并未太骄傲,以致不能写作一本精确的微积分教科书。非难这些学者的保罗·萨缪尔森是谁?而且,在通道的另一边工作,我认为,我们在综合教育战壕后面赢得经济学首领的时机已经成熟。(跑在史话的前面,人们会报道,到90年代,大学生的经济学教学的革新者常常是最大限度地突破作为博学学科的经济学的领域的那些人。)

创作的长期磨练

开始一件事是容易的,要使它完全成熟起来就必须付出劳动和辛勤努力。每写完一章,油印机便把它打印出来,以便在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中进行试教。我发现每章都需要努力工作,但是很愉快。

罗马非朝夕建成。我自然想到的问题会是一年的工作变为三年的写作和修改。当周末和暑假期间必须致力于把经济科学的根本复杂性简化为明白的、易于理解的文体任务的时候,只有一次允许我打网球。我发现,如果要使“沉闷的经济科学”变成如它本来就存在的那样激动人心的学科,甚至经济学的传统图解也早就应该重新绘制了。

当然,这话说出了关键问题的解决还在发展中。不久,出版商就像蜜蜂围绕花卉一样,云集到我的办公室。有些人说,“选择我们,因为我们是出名的。”或者说,“选择我们,因为我们是小型的,

我们将专心满足于你的需要。”或者说，“我们在48个州和1500所院校有推销代理商。”我往上抛了几个硬币，最后决定与麦格劳—希尔公司作为出版者签约。为什么？因为这家公司在科学和商业方面是有声望的吗？是的，部分原因是这样。因为该公司有极好的市场营销参谋机构吗？是的，部分原因是这样（但是，当该公司开始出售大学教科书的时候，其他大出版商并未垂头丧气）。主要地影响我的决定的原因是：（1）麦格劳—希尔公司出版了麻省理工学院放射实验室的极好的多卷丛书（该实验室是雷达和电子科学商品化的成功和宝库）；（2）麦格劳—希尔公司为了使声望重于利润而出版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我的极好老师约瑟夫·熊彼特的两卷本经典的《经济周期》。

关键时刻

1948年秋季，《经济学》第一版印好了。不管先前的工作是怎样的艰苦，或不管愿望是怎样的乐观，任何人决不可能确信前景将是怎样的结果。幸运地，从一开始，对经济学的这个新颖探讨就击中了响应的心弦。大小高等院校都选择这本新书。当每次新印书册卖完时，《经济学》照样连续多次重新印刷。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我们这本书的市场份额增长了。由于常青藤联合会的每个学校都采用这本教材，一年内本书就销光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它在遍及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的初级大学和州立大学所取得的成功。国际版不久就在英国扩散开了。当古根海姆联谊会接待我到欧洲时，为了可买到的已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和葡萄牙文的本书，我跑遍了每个城市的最重要书店。

我的劳动的价值超过了酬劳。且不说一个作者感到的正常自负，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高兴地看到本世纪后半叶将决定全球政策的公民一直在表明赞成或反对现代主流经济学。

对本书的各种评论加速了经济思潮。首先的评论来自约翰·